

郭绍虞

何旺生◎著

郭绍虞 中国诗学批评思想研究

GUOSHAOYU

ZHONGGUO SHIXUE PIPING SIXIANG YANJIU

口而
 頓山安而
 半折文衰
 者合體俱
 碎理三者
 中心直裂
 戴櫻銜宿
 戴穿抱穴
 木魅陽暎
 山精妖障
 况漫風雲
 不感羈旅
 無歸未始
 搖落弥差
 變衰淮南
 云木蒼涼
 長年悲斯
 去謂矣乃
 為歌日建
 章三月火
 黃河千里
 槎若非金
 谷滿園樹
 即是河陽
 看搖法建
 恰江潭樹
 猶如此
 何以堪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 思想研究

何旺生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思想研究/何旺生著.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7-5650-4068-9

I. ①郭… II. ①何… III. ①郭绍虞 (1893—1984) —诗学观—研究
IV. ①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9021 号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思想研究

何旺生 著

责任编辑 张 慧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人文编辑部: 0551-62903205 市场营销部: 0551-62903198	印 张	12.5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220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 刷	安徽昶颀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4068-9

定价: 36.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郭绍虞在工作中



1961年,郭绍虞先生(右二)与钱仲联先生(左一)、马茂元先生(左二)、夏承焘先生(右一)在上海合影



郭绍虞和夫人张方行及五个子女在燕京大学期间的合影

序

何旺生的书稿放在我的面前，要我写序。我当然责无旁贷，但写些什么呢？这部书稿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当时如琢如磨的共同探讨毕竟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但阅读书稿过程中，往昔的记忆鱼贯而到眼前，并引发了一些当年斟酌过的想法。经过多年的打磨，书稿比当年的论文更周密严谨，行文也更加圆融老到，在研究水平上总体来说是近年郭绍虞研究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成果。除了欣喜之外，我更关注的是书稿中的问题意识。

何旺生当初选郭绍虞研究作为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开题指导小组的几位导师都觉得他选得好。郭绍虞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大家，是自五四时期以来开创这个学术领域的先驱之一，搞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的人都绕不开他。尽管研究他的学者和论著也有一些，但和郭绍虞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相比，好像还不是很相符，因而存在着继续研究的较大空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何旺生当时还在担任他们学校的学报编辑工作，对学术界相关研究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和阅读积累，做这个题目对于至多只能用一半时间来进行研究的他来说，也是很相宜的。

郭绍虞自述一生在“象牙塔里，故书堆中”，尽管也为时代大潮裹挟，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参与者，为社会进步呐喊出力，但主要精力是投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成就也主要体现在批评史学科的建立上。对于这样一位以古代资料整理和复原为主的学者的研究，最容易陷入的就是对资料整理的资料整理，也就是流于对研究对象的研究情况作一番梳理排列，但离真正的研究却还有很远的距离。为了避免落入这样的境地，何旺生从研究对象的学术经历和学界争议中提炼出几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基点和思考方向：“第一，一个老学者，半个多世纪中竭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力求用新思想重新认识古代文学理论家，力求建立‘具有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文艺’，并以实际行动两次改写，为何始终磕磕绊绊，不能成功？……”

第二，‘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该如何面向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中国文论的民族身份究竟怎样才能建立，又该如何建立？第三，作为西学延伸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如何与中国的传统文论结合、与中国实践结合？”这些问题是不是郭绍虞研究中的全话题，也许可以商榷。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如果我们解开了第一个问题，后面两个问题也就不会很难解答了。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求解，使何旺生对郭绍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探讨，有了理论融入的空间和学理分析的思路，对提升论著的学术厚度和思想涵容起了不小的推助作用。问题的提出，有时候甚至比问题本身的解决更有意义。

郭绍虞一生致力于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但他并不是只会钻故书堆的老学究。他自学成才，躬逢新文化运动风起潮涌之盛，与五四先贤过从甚密，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同当时很多文化青年一样，他很早就接触并了解马克思的思想，翻译过《马克思年表》。他努力地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运用到自己的文化撰述和学术研究中。但郭绍虞并未实现自己的理论创新预期，对此，何旺生归之于郭绍虞“还来不及消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思想，又没有把它转化为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在实际研究中就不免会出现偏差”。郭绍虞屡经努力未果，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尤以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意见不能廓清，对各家观点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中国文学批评史》1956年修订后记）

自觉追求，目标未达。个人致力不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全部原因。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偶尔也涉及和讨论过一些文学作品和文艺现象，但基本上是从认识论角度将其当作意识形态的一种形象表达活动。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也有一些表现社会冲突的作品，如白居易为时为事而写的诗，但从总体上说数量不多，艺术质量也不高。中国古代文学大量的是言志作品，指归在抒发胸臆，追求的是语言之美，这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成就最高的体现，也是古典文学批评最为出彩的畛域。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非有机地去分析这些古代的佳作，总不免有方枘圆凿之感。这就是郭绍虞在研究中总是力不从心的内在原因了。

何旺生还用较多笔墨分析了郭绍虞在上世纪50年代后所遇到的另一思想困惑，就是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纳入所谓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规律中去。如果说前面的误区是郭绍虞自觉理论思考中碰到的障碍，是自己研究不深

的结果，那么后面的困惑则完全是外来错误理论强行介入中国学界产生的苦果了。前面说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比较高看反映社会矛盾的文艺作品，到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语境下，这种倾向于写作的作品被拔高到远超其他作品的优越地位。在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上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是作为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被写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一切非现实主义创作全部作为对立面受到打击和排斥，连浪漫主义都不配有容身之地。50年代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一面倒”方针，文化教育全盘接受苏联思想模式。随着苏联教材和教授的引进，苏式现实主义理论也成为中国大学课堂和文艺创作界的不二原则。在这种文艺体制下，整个人类的文学艺术史，被硬生生改造成一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郭绍虞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企图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归纳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不出意料的是，他的这次努力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在写于1957年的《从“文”和“文学”的含义说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一文中，他坦陈在当时风气影响下“也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纳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规律之中，但写到古文运动又觉得不能以此相绳”。这说明他已经面临这种理论对中国文学的不适用性，但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理论本身的荒谬性。所以他说“问题不在这根贯穿文学史的红线，而在具体运用这根红线时是不是简单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绪论）。是受限于认识水平，还是受制于当时的政治规制，他只能存疑这根红线的简单化运用，而没有否定这根红线本身。政治家炮制这样的红线概念，预设的前提是现实主义是进步的革命的，那么反现实主义作为它的对立面便是落后的反革命的。这也像操弄儒法斗争史一样，法家被认定是进步的革命的，那么反法家的儒家便是落后的反革命的。这种不证自明的预设非常荒谬，且不说非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创作中有许多作家作品在历史上起过良好的作用、在人民中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现实主义的创作也并非都是进步的革命的。就以列宁评论过的俄罗斯作家阿威尔岑柯为例，这位作家将自己的十二篇小说集为一本题为《插到革命背上的十二把刀子》的小册子，列宁称其为“一本有才气的书”，并评价小说对当时革命时期的人们困苦生活的描写达到了“惊人的真实”。显然这是一本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它却是极度仇视革命的文学作品。茅盾显然也看到了这样的分野，所以在评论中指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有些政治人物无视文艺创作的这种情况，虚造出所谓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规律，目的无非是要确立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地位。

由此而言，郭绍虞的理想遭到落败是注定的，而非仅仅是研究不力的缘故。

这也不是郭绍虞一个人的不幸，而是那个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现实主义理论教条应声落幕，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未获得思考和学术的自由。我们痛惜郭绍虞和像郭绍虞一样博学厚重的大师学者，未能在有生之年取得应有的更大成就，但我们又庆幸郭绍虞在不幸中是幸运的，文化浩劫固然使他创立中国民族形式或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目的无法达到，但他投入的工夫毕竟没有白花，至少为后人的研究留下了丰厚的资料大全，他作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地位牢不可破，不至于像某些理论家按照时势需要炮制出来的理论，事过境迁之后一片荒芜颗粒无收。

何旺生对郭绍虞学术活动的研究，与其说是对他成功经验的总结，不如说是对他失败教训的揭示，而后者对厕身于当下语境的我们似乎更有帮助。在建设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如何面对传统文化遗产，如何对待外来思想文化资源，郭绍虞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对于我们更有警示意义。何旺生对郭绍虞的研究不止这一个方面，他对郭绍虞在中国诗学批评的理论构架、范式建构和思想谱系上的探考，都作了要言不烦的分析评述，对我们了解这位学者的人生和学术活动的全貌，有较大的帮助。但我还是认为，这本书的主要价值，仍然在于对郭绍虞失败教训的研究，这对于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讲具有普遍的意义。就此而言，何旺生如果掌握的材料更丰富一些，对研究对象的了解更深入一些，对时代要求的体会更切近一些，他的研究或许会更加鞭辟入里，更加发人深省。当然，这要算是对他进一步的苛求了。

对这本书的全面分析和学术评价，非这篇短文所能承担。我说了我看了这本书后最想说的话，就此打住。就把以上所说，作为本书的序。

杨文虎

2018年7月3日于沪上

C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001)
一、关于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的接受	(001)
二、本选题的研究对象	(011)
三、本选题的研究内容	(016)
第一章 郭绍虞的学术人生	(018)
一、郭绍虞的生平	(018)
二、郭绍虞的著述	(020)
第二章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的理论构架	(046)
一、诗学范畴批评	(046)
二、诗话研究	(054)
三、诗学语言批评	(060)
四、文体学批评	(067)

第三章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的范式建构	(073)
一、研究范式：“以问题为纲”	(074)
二、诠释范式：“保存古人的面目”	(082)
三、意义范式：通向一种“文化诗学”	(095)
第四章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的思想谱系	(105)
一、“狷”而时“狂”的知识分子人格	(106)
二、“整理国故”与新思潮的碰撞	(111)
三、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涵容	(119)
第五章 郭绍虞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建构意义	(129)
一、郭绍虞的矛盾	(129)
二、郭绍虞对中国文论建设的若干意义	(137)
附 录 郭绍虞学术年表	(154)
参考文献	(174)
后 记	(186)

绪论

郭绍虞（1893—1984），我国现代杰出的古典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实际奠基人。自1913年到上海，进入进步书局（原上海文明书局），参与编辑《历代文评注读本》《历代诗评注读本》，郭绍虞便开始了七十余载的学术人生。他的一生，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研究。毫无疑问，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郭绍虞的学术人生已是一个“历史文本”，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解读。尽管客观真实的历史只有一种，但理解者的立场、所运用的分析架构不同，历史总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书写”。唯其如此，在本书正式写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前贤们对郭绍虞的“书写”和评价。

一、关于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的接受

1934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出版后，郭绍虞开始进入学者们的学术评价视域，或浓墨重彩，或简要描画，品人衡文，摩肩接踵。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纵观学者对郭绍虞的评价和接受，大体表现为三种维度，即：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评说、对作为学术史的郭绍虞的言说、对作为方法论的“郭绍虞经验”的研究。这样的三个维度，历时性与共时性相汇通，共同构成了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的学术研究史与接受史。

（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评说

1934年5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此后，由于战争和国难，直至1947年，郭绍虞才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

第一个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评说的是胡适。1934年2月17日，胡适应郭绍虞之请，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但未收入书中。胡适肯定了郭绍虞“搜集材料最辛勤”，“郭君的论断未必处处都使读者满意，但他确能抓住几个大潮流的意象，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迹”。胡适认为，郭著的“最大功用在于辅助文学史，在于使人格外明了文学变迁的理论的背景”^①。胡适不满意郭著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作演变期、复古期和完成期三个大时期，不满意郭著之论文学观念，将“神”“气”等后起的观念牵入古代文学见解里。胡适以他“历史学家的眼光”，基本把握了郭著的脉搏，有些见解仍有后人不能及的地方。郭著后经胡适审定为教育部颁的大学用书。不过，胡适的评价未必完全准确，文学史毕竟不同于历史，它自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这或许也是郭绍虞未能采用胡适序言的原因之一吧。

第二个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作评说的是朱自清。朱自清1934年10月发表在《清华学报》第九卷第四期上的《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指出，郭著“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算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从而“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无根的游谈”；郭绍虞“随时引证思想方面的事件。这已不止于取材而兼是方法了。用这个方法为基本，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郭君还有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分析意义，他的书的成功，至少有一半是在这里”^②。朱自清也提出了郭著几处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整体而言，朱自清首次提出了郭著的系统性特征，充分肯定了郭绍虞在学科体例和方法论方面的创造性成就，为后人评判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奠定了价值基调。

几乎与朱自清同时，1934年10月17日，钱锺书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撰文《论复古》，通过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学复古”和“文学进化”两个概念的辩难，直指郭著文学观念、历史观念的失当以及对对中国文学发展进行价值判断时的前后矛盾之处。钱锺书说：“（一）文学革命只是一种作用（function），跟内容和目的无关；因此（二）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而（三）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抬出旁一个古代；

^① 原稿首页，胡适有眉批自注云：“此序写成后，我写信与作者，能不用最好。他回信赞成不用，而将序末二段收入《自序》中。此文作废。适之，廿三，二，廿五。”引自《胡适全集》第12卷，季羨林主编，严云绶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②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39—542页。

(四) 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 这个革新定不会成功。”钱锺书认为, 郭书所主张的“‘纯文学’才是‘正确’的文学观念”, 是缺乏心理学、美学等方面的学理依据的; 郭绍虞是将“历史事实”与价值判断“搅在一起”了^①。钱锺书的辩难, 指出了郭著中不易被人发现的矛盾, 笔调比较尖锐。郭绍虞针锋相对, 于10月24日在《大公报》上以《谈复古》为题, 对钱锺书作了回应。以今天的眼光看, 钱锺书隐约揭示了郭著中隐蔽的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文学观和历史观, 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地理解郭著本身, 更有助于我们辩证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演变。

20世纪50年代, 中国文学艺术界进入了“思想改造”的特殊历史时期, 郭绍虞感受着时代的风雨, 以“自认是严肃”的态度, 于1955年第一次改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1956年5月31日, 《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海风的近6000字长文——《评“中国文学批评史”》, 从“胡适派的唯心主义观点”“关于理论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问题”“关于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与所谓‘正统’问题”三个方面, 对郭绍虞的这次改写提出了所谓的“商榷”, 认为郭绍虞受到了胡适派的“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 “没有科学地阐明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正确地根据文献的记载, 分析和解释这种规律”, 因而“发生了许多错误, 歪曲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历史”, “违反了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点, 当然无法阐明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规律”。这样的评价, 当然是时势使然, 但以浓烈的政治批评话语替代冷静的学术批评话语, 以政治的合法性遮蔽了学术的合理性, 缺乏基本的客观公正, 不仅消解了批评的有效性, 而且有碍学术的正常发展。兢耕虽然没有超越当时特殊的思维模式和话语规范, 比如他也认为“在同一时期里, 总有一个比较是主流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理论可以作为中心来叙述”, 而郭书“在叙述各种文学思想时, 往往放在一个平面上来叙述, 分不出主次, 因而也就看不出思想和理论批评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 以及发展的总的趋向”^②, 但总体而言, 兢耕比之于海风, 其批评话语的意识形态色彩大为削减, 而增强了难能可贵的学理性, 心态也更为平和。如对于郭书的“对戏曲和小说的理论和批评重视不够”, 兢耕认为是由于“作者仅仅抱着诗文评的传统看法”, 这样的评价, 就比较符合郭绍虞的思想实际。其实, 对于郭绍虞

^① 钱锺书:《论复古》, 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4年10月17日。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 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第327—334页。

^② 兢耕:《“中国文学批评史”》, 《文学研究》, 1957年第3期。

1955年、1959年的两次改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唐弢的评价是最精辟的。20世纪80年代，唐弢撰文说：“就《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绍虞先生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古代的文论、诗话进行科学的分析。他在解放初期修改了一次。说实话，那次修改是失败的，新旧观点尚难融会贯通，显得有点生硬，扞格。文艺界一位领导甚至对我说，他读着修订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心里很难过。我倒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了解绍虞先生有所不为的狷性性格，并且确信这种狷性必将引导他走上科学道路。第二次修订本就比较熟练，比较融洽了，我庆幸自己没有作出错误估计。”^①

1993年，在郭绍虞百年冥诞之际，王元化作《记郭绍虞》的纪念文章。王元化认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章节上并不整齐划一，而是或以家分，或以人分，或以文体分，或以问题分。表面看来，全书很不一致，显得有些琐屑零乱，但实际上却是费过一番经营擘划的功夫。这种编例摆脱了形式上的构囿，更能勾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真实面目，触及它的深微之处。但是这一点往往不易为人理解。”^②

1999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将郭绍虞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与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卷合集重印，王运熙有一简练的《前言》。2000年，蒋凡与郭绍虞之女郭信和主编出版了《郭绍虞说文论》，蒋凡作《导言》一篇。王运熙说：“著者在论述一些批评现象时，往往在纵向上注意前后的继承发展关系，在横向上注意同时代文论的相互影响关系，在涉及背景时又注意说明文论与文学创作、哲学思想的关系，凡此等等，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历史线索和图景，而不仅仅是按时代先后排列的代表性文论的辑录。”^③ 蒋凡提出，“作为一代宗师，郭先生首先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郭先生的古文论研究，……具有无法替代的历史地位和启示来者的现代意义”；郭绍虞“在古文论研究中，牢固树立了文学与语言相结合以推动文学演变的理论观念”；“非常重视古文论研究中的形式批评”；“极其重视文学观念的演变，并对古文论中的诸多具有民族性的概念和范畴，从资料搜集，到归纳演

① 唐弢：《狂狷人生——纪念郭绍虞先生》，《唐弢文集》（第四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91页。

② 王元化：《记郭绍虞》，《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③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绎，最后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来概括其规律和本质、价值和意义”^①。王运熙、蒋凡两位学者的评价，简洁而凝练，确实把握了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研究的真谛。

2004年，李咏吟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文艺学卷》作为面向大学生进行经典解读的普及性读物，其中的第十二章“《中国文学批评史》：诗学的历史解释”^②，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置于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与文化背景中，通过细读，较清晰地阐明了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经典性。文章特别提示读者注意郭著中的“文”之观念、西学的影响、整理国故与批评史的历史认知，其所摘选的前人对郭绍虞的多维视野的评说（包括总体评价、体例特点、存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力印证了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经典性。

（二）对作为学术史的郭绍虞的言说

20世纪90年代后，对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开始勃兴，一批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的论文应运而生。郭绍虞自然成为学者们散点透视的聚焦点。学者们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接受和评说，开始向纵深拓展，并逐渐超越作为著作的、纯粹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本身，而转向学术史视角。

王元化第一次指出，郭绍虞的学术成就广泛而深微，要全面评价郭绍虞，就必须拓宽视野，“仅仅把他视为古代文论的学者，忽视了他在语言文字方面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就不能对他作出全面的评价。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不少创见，往往发人所未发”^③。王元化提出的“由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拓展到其他学术领域”的观点，随后在一些研究者那里得到了落实和发挥。比如，语言学学者申小龙指出：“郭绍虞以一个古典文学批评史的眼光来审度现代语文分析，其语文批评往往别开生面，新颖宏富，给人深刻的感悟。郭绍虞的语文观处处显示出汉语的人文精神与西方语言的深刻对立，入木三分地针砭了汉语语法研究中照搬西方语言学科科学主义立场和方法的时弊，体现出对中国语文精神的

① 蒋凡、郭信和编：《郭绍虞说文论·导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李咏吟：《多维视野中的百部经典·文艺学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279页。

③ 王元化：《记郭绍虞》，《思辨录》，第171页。

深刻的文化反思。”^① 叶云鹏认为，郭绍虞“在大学语文教育目标、教材编选、教学方法等方面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对大学语文学科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研究郭绍虞大学语文教育思想，对于改进大学语文教育，对于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②。这些富有实效的探索和研究，充分肯定了郭绍虞在语言学和语文教育领域的卓著成就，也在实质上拓展了对郭绍虞的接受领域。

1996年，汪春泓发表《肇端既邃密 后来加深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70年回顾与展望》一文，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置放到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初步揭示了郭绍虞学术思想的文艺学学科意义和民族特色。汪文认为：“郭著抓住文学本体论来结构全书，而这条一以贯之的脉络，源远流长，确实涵盖着中国文学批评史极丰富的内容，并且体现出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汪文指出郭著的优长在于，第一不是机械简单地从研究对象中搜寻文学理论质素，不用现成理论观念去硬套古人；第二在历史的立体网络中辨析文学理论和现象，“尊重历史本真的面貌”，“努力返归当时语境，其注重历史感的自觉意识，尤应为后学所效法”。不过，汪文认为，“郭著专注于文学本体论，专注于诗文‘第一义’，太高自位置于形而上，虽也有对声律问题的仔细考订，但于形而下者，似乎较为惜墨”^③。这似乎有些拘泥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本身，没有顾及郭绍虞的学术全貌，因为从1921年发表《谚语的研究》到20世纪40年代，郭绍虞直接研究语言和声律等问题的专门文章就有十余篇，足见郭绍虞对该问题的重视和研究的深广。

1996年，王瑶主编的学术史研究丛书《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出版。该书第八章《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作者董乃斌），洋洋三万余言，可以说是第一篇系统地研究郭绍虞的论文。该文细致考察了郭绍虞的学术追求、治学成就、研究方法及其代表的学术思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甚为周详。文章指出，郭绍虞的一切学术活动，大体上是围绕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轴心的。“无论他之主张将语言学、修辞学打通，还是他论析中国古代文学的语

① 申小龙：《中国语文精神之文化反思——郭绍虞语法哲学研究》，《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

② 叶云鹏：《试论郭绍虞的大学语文教育思想》，《台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③ 汪春泓：《肇端既邃密 后来加深沉——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70年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